

第一章 中国养猪史

纵观世界上对于猪的驯化与饲养，以我国最早。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经验。认真总结我国劳动人民的养猪历史经验和成就，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文化遗产，达到古为今用、开创未来的目的，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中国猪的起源和驯化

一、中国家猪的起源

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但中国家猪起源于何种野猪？根据考古发掘，在距今六十万到一万年间更生世中期和晚期洞穴中出土的野猪骨骼化石，经研究鉴定，有欧洲野猪（*Sus scrofa* L.）和李氏野猪（*Sus lydekkeri*）两种。而欧洲野猪分布广泛，共有 15 个省、市、自治区，几乎遍布南、北、东、西、中各地。李氏野猪分布面较狭，仅在北京、河南、山东和陕西等四省、市。进入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野猪骨骼材料，如在陕西西安半坡、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南安阳殷墟、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经鉴定均属于欧洲野猪，而李氏野猪尚未发现，可能已经灭绝。从出土的野猪骨骼化石及从更新世初期以至现代有关牙齿结构性质和体型大小的变化等材料，可以证明中国家猪始源于欧洲野猪。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家猪的起源因其来源不同，因此它们的驯化不是一个中心，而是由我国南北各地劳动人民驯化了当地的不同欧洲野猪亚种而形成的。就我国已发现的野猪（图 1-1，图 1-2）的分布、类型和驯化了的后裔，可归纳为：

华南野猪（*Sus scrofa chirodontus* Heude）：分布在我国南部和海南省，是南方地区各猪种的祖先。

台湾野猪（*Sus scrofa taiwanus* Swinhoe）：分布于我国台湾省，是我国台湾小耳猪的祖先。

华北野猪（*Sus scrofa moupiensis* Milne-Edwards）：分布在我国华北、四川、安徽等地。据张仲葛研究，认为我国华北地区所产的猪种，殆由华北野猪驯化而成。

东北白胸野猪（*Sus scrofa leucomystax* Temminck）：李正谊认为我国北部猪乃由东北白胸野猪驯化而来。此种野猪与华北野猪亦相类似。

矮野猪（*Sus scrofa silvianus*）：瓦格勒氏认为这是中国矮种猪的祖先。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山腹以及与云南接壤的山中，这种野猪头颅骨的长度有时只达 15cm。

此外，在我国的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还发现以下的野猪类型：

乌苏里野猪（*Sus scrofa ussuricus* Heude）：分布在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和毗连的北部几省，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部。

蒙古野猪（*Sus scrofa raddeanus* Adlerberg）：分布在我国内蒙古一带，以及蒙古南部 Transbaikalia 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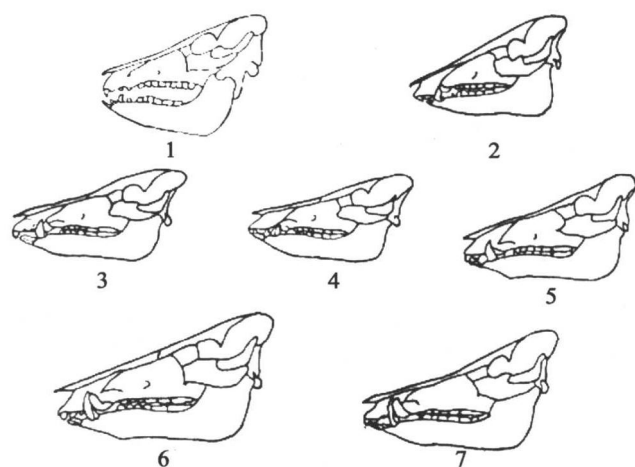


图 1-1 各种野猪的头骨

1. 华南野猪头骨 2. 台湾野猪头骨 3. 华北野猪头骨 4. 东北白胸野猪头骨 5. 蒙古野猪头骨
6. 乌苏里野猪头骨 7. 新疆野猪头骨

(引自中国猪品种志编写组,《中国猪品种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图 1-2 迄今发现最古老猪画之一, 约有 4 万年历史

(引自赵书广等,《中国养猪大成》,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新疆野猪 (*Sus scrofa nigripes* Blanford) : 分布在我国的天山喀什地区, 以及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带。

由上可见, 我国猪的驯化是多元的。我国南、北各地培育出的优良地方猪种, 是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我国猪的驯养历史

我国悠久的养猪历史, 可以从大量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佐证。1921 年, 我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河南省浉池县仰韶村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 有许多家猪骨骼, 并找到初具雏形的“上栋下宇”建筑, 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已并非全是穴居野外的生活, 而养猪亦已盛行, 时间距今五六千年前。1954~1958 年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文物中, 有家猪骨骼和绘有猪形象的花纹陶器, 说明半坡人在五六千年前已经养猪。1959 年在距今约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山东省大汶口古文化遗址中, 出土兽骨以猪骨最多, 而且从出土猪头骨形状来看, 和李氏野猪已有了一定差别, 生产性能比野猪有很大提高。在大汶口遗址的地层中还发掘出一件猪形陶 (图 1-3), 塑造猪形惟妙惟肖, 身后有睾丸, 说明人们当

时对猪的形态特征已有较深的了解。从分布更广的龙山文化遗迹中，发现了不少家畜的头骨。经鉴定，它们是犬、猪、兔、鬃、鱼等残骸。在甘肃省齐家文化遗址中，也见到大量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说明远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已进行猪的饲养。1973年和1976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和1980年在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现的许多动物骨骼中，家猪骨骼占很大部分，并有出土陶猪，证实了我国养猪的历史可远溯到公元前五千年，也就是距今约七千年（图1-4，图1-5，图1-6，图1-7）。在我国华南地区广东省经发掘和整理的二三十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中，从贝丘中发掘出来的动物遗骨来看，以猪骨更多。经测定当时贝壳的年代，距今约六千年，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发掘的猪牙、猪骨，用 ^{14}C 测定，结果为 $11\,310\text{年} \pm 180\text{年}$ ，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家猪骨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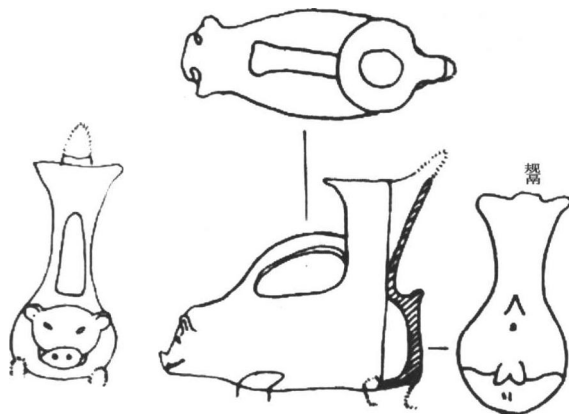


图 1-3 加砂褐陶猪形陶



图 1-4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头骨



图 1-5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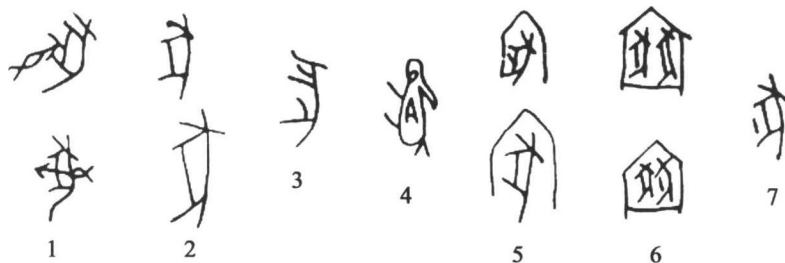


图 1-6 关于养猪的甲骨文*（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教授誊写）

* 我国最早的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

彘，即野猪，表示非射杀不可 2. 豕，代表家猪 3. 豨，雄猪，实际上可能是种猪

4. 豚 5. 家 6. 圉，表示圈养 7. 表示阉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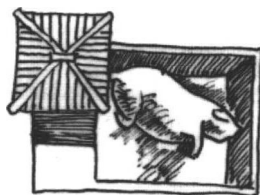
河南洛阳出土汉代陶猪圈



江苏徐州出土戟波汉陶猪圈



江苏南京出土六朝陶猪圈



河南济源新莽时期陶猪圈

图 1-7 各种类型的青瓦猪圈

(图 1-3 ~ 图 1-7 引自张仲葛等,《中国实用养猪学》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以上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南北各地养猪已有六七千年乃至一万多年的悠久历史。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养猪业

一、中国古代猪种的形成与选育

我国古代猪种的形成,是与原始农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随着人类对工具的改进,采取了“系绳”、“圈栏”等方法,将捕获的野猪,饲养在人工制成的圈栏中,限制其行动,促使其发生变异。经过若干代后,猪的运动在受限制的环境里,开始影响运动器官的机能,性能变得温驯而易于调教,猪的警觉性变差了,体态也变得肥胖了。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得以定居,同时为养猪提供了饲料,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细心的饲养和管理,使猪的体型,甚至内部结构都发生了有利于人的改变。在距今一万至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猪已成为我国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主要家畜。殷商时代,对于猪的选育技术已有相当成就。我国汉代对猪的选种也已有了一定水平,从华南汉墓中发掘出的汉代青瓦猪,代表华南小耳型猪(图 1-8),其外形是: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粗、背腰宽、四肢短、臀腿发育良好、鬃毛柔细,品质十分优良。这种优美的体态说明我国古代猪种早已具备早熟、易肥、生长快、肉质好的特性。又如华北汉墓中出土的汉代青瓦母猪及仔猪,代表华北大耳型猪(图 1-9),头长而直、耳大下垂、体型较大;母猪有发达的乳房,仔猪有丰富的体况,可以说明华北地区早已培育出良好的猪种。在外形上已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猪种体型较大,头长而直,耳大下垂;小型猪种体型小,呈椭圆形,头小,耳短小下垂,四肢细短。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了有关当时猪种的情况。如《尔雅》中记载的猪种有豮、豮、豮等。在《广雅》中还记载有顿北猪、梁豮、重豮等。

我国古代猪种的形式,还与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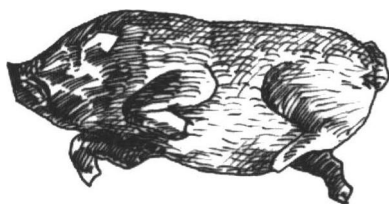


图 1-8 汉代华南小耳型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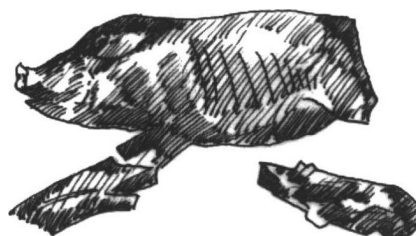


图 1-9 汉代华北大耳型猪

(引自张仲葛等,《中国实用养猪学》,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地形复杂,有多种气候带。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河流纵横,交通不便,猪种因长期处于地区隔离,闭锁或在某种定向流动之中,加上群众的选育,逐渐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猪种。

我国古代对猪的选育已有相当的水平 and 成就。商代韦豕相传是最早的猪的选种专家。在《周礼》中,记载了各种猪的区分方法,把猪通称为彘(音至)或豕,并把猪分别区分为:则渴其尾谓之豕,后蹄废谓之彘,三毛丛生谓之猪。牝豕曰豮(音母)曰豮(音伟)曰豮(音巴)曰豮(音痿)。牡豕曰豮(音家)。豕之小者曰豮(音冥)曰豮(音斛)曰豚(音屯)。三个月的谓之豮(音奚),六个月的谓之豮或豮(音综)。也有把一岁的谓之豮,二岁的谓之豮,三岁的谓之特或豮(音坚),四岁的谓之豮(音愤)。阉割的豕也叫豮,豕老谓之豮(音艾)豕高五尺者谓之豮(音支)体黑头白谓之豮(音觅)四蹄皆白谓之豮(音孩),母豕之老者谓之豮(音瞿)少者谓之豮(音雏)。先秦时期记载有“六畜相法”,是根据对家畜的体质、外形的观察来判断其生产性能的方法。由于外形和生产性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合乎科学原理,这一方法,在秦汉及其以后时期得到继续发展。汉代在《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留长孺以相彘立名”。明末,方以智(1643)所著《物理小识》中曾引留长孺的相彘法:“短项无长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这说明当时在鉴定技术上已掌握了机能与形态的关系,了解到外形是体质的外部表现,能反映出它的生理机能的特点和生产能力,因此根据外形、发育和生产能力来选择生长发育好、生产能力高的猪留种用,淘汰不合要求的劣种,这对于汉代猪种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汉书·食货志》说:“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告诉人们养猪要适时配种,才能获得好的繁殖效果。

古代猪选育技术的记载,最集中的反映在公元6世纪我国北魏时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中。他全面、系统、深入、科学地总结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经验,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流传至今的一部最早的农业科学巨著。它记录了各种家畜和家禽品种类型的名称、特征和来源,总结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选种的经验。在《齐民要术》有关选种的论述中,尤其着重于母系的选择,提出:“母猪取短喙无柔毛者良。喙长则牙多,一厢三牙以上,则不烦畜,为难肥故。有柔毛者焰治难净也”。贾思勰根据物种可变的观点,提出通过选种来提高种性,使畜禽更适合人类的需要。在猪的选种技术方面的记载,以后则散见于元朝的《农桑辑要》(1273)明朝徐光启撰写的《农政全书》(1639),清朝张宗绪撰写的《三农纪》(1760)。其中关于猪外形鉴定的要点,如“喙短扁、鼻孔大、耳根急、额平正、背腰长、腓膻小、尾直垂、四蹄齐、后乳宽、毛稀者易养。喙长则牙多,不善食。气膻大,食多难饱。生柔毛,久难长。耳根软,不易肥。鼻孔小,翻食。首皱、蹄

曲，不易壮。前后不开，后凡相合者，难长。三齿莫为种。……黑肤白花、黑毛白胸、凡黑白杂嘴、杂足者、并勿畜。黑皮白毛、乌纹入鼻、通黑通白者可饲”。“作种者，生门向上，易孕。乳头匀者，产仔匀。产后两月而思孕，不失其时，一岁二生其豚，”……

以后，在上述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在选种技术上除注意外形鉴定，要求体质结实，各部发育匀称、骨细、少筋、多膏者外，并注意猪增重的经济价值，以选求吃得少、长得快的猪，认为这样的猪种“食物至寡，故人畜养之甚易生息”。这些从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现代猪种选育工作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古代的养猪技术

我国古代不仅在猪的选育技术方面有相当的水平和成就，而且在利用青粗饲料养猪以及猪的饲养技术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国劳动人民对猪的杂食习性有充分的了解，据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载：“猪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耨水藻等近岸，猪食之皆肥”。利用我国猪耐粗饲的特点，把春秋生的小猪随时放牧，如《齐民要术》中的：“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则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穹冬春初”。意即：春夏生的小猪，除随时放牧外，还要每天补一些糟糠等饲料。八、九、十月仅放牧而不再补给精料。所有饲料贮存起来，留待冬末春初无法外出放牧的季节饲用。说明当时在饲养方法上，已采用了“吊架子”的方式，把有限的精料放在刚断乳不久的仔猪和冬末春初的舍饲催肥阶段。汉许慎《说文》说：“以谷圈养豕也”。说明我国至迟在周朝已经用谷物喂猪。汉刘安《淮南王万毕术》载有肥育猪的方法，并为后人所采用。

在《齐民要术》中，还确定了公母猪配种的比例，即“凡母二十，一猪郎”。提出“母两年五乳”，多胎高产的经验。在对初生仔猪的护理上，提出了关于寒月生产的仔猪防寒护理的方法：“……十一、十二月生者，一宿蒸之。蒸法：索笼盛豚，着甑中，微火蒸之，汗出便罢。豚不蒸则脑冻不合，出旬便死。所以然者，豚性脑少，寒盛则不能自暖，故须暖气助之”。在仔猪的培育方面载有“供食豚，乳下者佳，简取别饲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难足，宜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肥速”。再如清朝王鼎所撰《鹵风广义》（1740）一书载：“猪孕四月而生，母猪怀子时不可诱以细食，恐猪肥油大，则生子难活。…生子后，母猪当诱以细食，生乳以奶猪子”。“豚子初生，宜煮谷饲之，或大麦屑、或豆腐、荞麦稗秫屑，务宜煮遂，少加草末糠麸饲之。不可与母猪同食。或置木栅栏，留空，只容豚子出入。或圈墙下开一小窦，令豚子出外饲之亦可”。十分精辟地告诉人们从母猪妊娠开始直到出生后如何对仔猪进行饲养管理，以达到母壮仔肥的目的。

在肥猪的饲养技术上，也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掌握栏干食饱，少饲勤添的原则，如《齐民要术》载：“圈不厌小，圈小肥疾，处不厌秽，泥秽得避暑。亦须小厂以避雨雪”。又《三农纪》载：“若养数猪，饲需下少。豢家人持槽工圈外，每一槽着槽口杓，轮而复始，令极饱。若剩槽，复加麸糠，散于槽上，令食极净方止。善豢者六十日而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载：“猪多，总设一大圈，细分为小圈，每小圈只容一猪，使不得闹转，则易长也”。还载有肥猪法：“用贯众三角（古代斤的异体字）苍术四两、黄豆一斗、芝麻一升，各炒熟共为末，饵之，十二日则肥”。可见当时人们已采取饲以豆类高蛋白、对猪阉割去势、做小圈限制猪运动和驱虫等综合措施，以快速饲育肥猪。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阉割技术，乃是我国甚至世界畜牧业历史上的大事。早

在公元前 16 至前 11 世纪的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知睾丸的功能和对动物的生殖机能的作用。为了制服雄性动物的凶猛性格，使其变得温驯易养，我们的祖先发明和推广了阉猪的技术。《易经》记载：“豮豕之牙吉”意即阉割了的猪 性情就会变得温驯 虽有犀利的牙，也不足为害。《礼记》上写道：“豕曰刚鬣，豚曰腍肥”，意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叫“豚”。至公元 6 世纪有了进一步提高。如《齐民要术》提出：“初产者……六十日后犍”。原注：“犍者骨细肉多，不犍者骨多肉少”。唐《四时纂要》提出：“犍者骨细而易养”。《豳风广义》也认为阉割后“易长易肥”。古人明显地告诉人们：阉割不仅可使猪易于饲养和加速肥育，且可改变肉的品质。《三农纪》更明确仔猪适宜的阉割时间，提出“雄者一月去势，雌者二月剪其彘”。这与现在小公猪 30d 左右，小母猪 40~60d 进行阉割是相当的。

我国最早记有“兽医”一词的文献是《周礼》，其中载有：“兽医、下土四人”；“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刮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说明我国早在周秦（至迟在战国时期）兽医已经非常发达了，不仅有了内科和外科，而且有了一定的编制和职掌，制定了诊疗程序，并且重视护理工作。用针灸治疗家畜疾病，早在公元前 10 世纪就有了记载。如西汉刘向著的《列仙传》载有马师皇用“针其唇下及口中和甘草汤治愈”，可以说明中兽医“方不离针、针不离方”的传统由来已久。由于在旧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把马居为六畜之首，所以历代在兽医学技术资料方面也是以马为重点，而有关猪、禽之类的专著受轻视以至于失传。例如，堪称为我国古代养猪专家的商丘子，他最晚也是公元前五百年前的人。晋张华《博物志》便说他著有养猪法（内有猪病治疗方剂等）。《汉书艺文志拾补》的作者认为，古代有两种养猪法，撰写人一是商丘子，一是卜式，但均佚失。这些都是我国养猪技术史上的重大损失。

我国劳动人民历来十分重视农牧结合，养猪积肥，促进粮食增产，即猪多、肥多、粮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富国篇》中有：“多粪肥田 是农夫众庶之事也”。汉代逐步推广圈养猪，使农家肥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广州出土的汉代陶猪圈是两层的栅居，上为住所或农产品加工场，下为圈栅，这样的猪圈冬暖夏凉，既节约用地，又便于积制粪肥（图 1-10）。随着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初期的养猪业也必然兴盛起来，规模有所扩展，而豢养技术也日益精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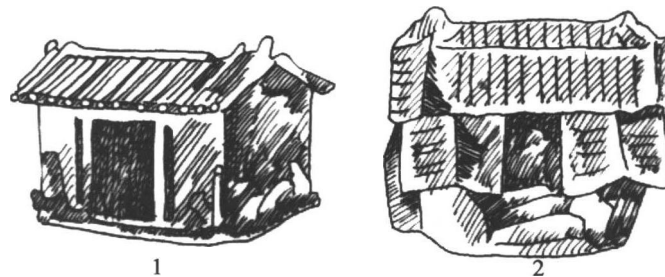


图 1-10 广州东汉古墓出土的陶猪圈（三合屋设有猪圈）

1. 与作坊联合的猪圈（正面图） 2. 与作坊联合的猪圈（俯视图）

（引自张仲葛等，《中国实用养猪学》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以上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的养猪技术，对现今的养猪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中国养猪业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与近代养猪业的发展

我国的养猪业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猪骨中，幼猪骨骼占有较大比重，说明当时宰杀幼猪相当普遍。可见，在那时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养猪吃肉是防止饥荒、调节粮食不足的一种手段。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宰杀幼猪逐渐减少，猪的数量和类别也增多起来。

西汉时期（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3 年），由于牛耕区域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水利事业的兴盛，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高峰，养猪业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养猪以放牧方式为主。西汉以后，为了积肥，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猪圈（图 1-7，图 1-10）。至三国、晋、南北朝（公元 220 ~ 581）时，舍饲与放牧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隋、唐（公元 581 ~ 907）时期，养猪业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来源。唐代张鷟《朝野僉载》（公元 713 ~ 741）中载：“唐拱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新唐书卷二二三下·奸臣卢杞传》（公元 1044 ~ 1060）载：“大曆末，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皆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说明那时官办猪场规模有猪数千头以上者。

到了宋代（公元 960 ~ 1279），由于印刷术的进步，文献资料出版的繁荣，不少有关养猪业的发展情况，散见于诗文、笔记和小说之中。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云：“东坡性喜嗜猪肉，在黄冈时，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冈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说明当时产猪很多，物美价廉的猪肉已成为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又据《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末年京都开封每天从南熏门赶进猪只的情况是：“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头，祇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可见当时城市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和养猪业发展盛况。元代（公元 1271 ~ 1368）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强调“以农桑为急务”，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养猪业也随之得以发展。我国在明朝以前，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文化繁荣，是世界上先进发达的大国。

明代（公元 1368 ~ 1644）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养猪技术和饲养水平也相应提高，养猪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到清代（公元 1644 ~ 1911）的养猪业比明代更有较大发展，据考证：当时各府、州、县大都把猪作为“物产”列入地方志中，当时四川省养猪为全国之冠，据《蜀海丛谈》（卷一）载：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折中说：“川省宰猪实较他省特多”。“川省每年约共宰猪三百万只之谱”。但明清两代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统治、摧残与压制，使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而此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迅速的时期。而我国恰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农林经济基本自给自足。

1840 年爆发鸦片战争，我国战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相继侵入我国，外侨带来了一些外国猪种，有中约克夏（Middle Yorkshire）、大约克夏（Large Yorkshire）、巴克夏（Berkshire）、杜洛克（Duroc）、波中猪（Poland China）、切斯特白

(Chester White) 和泰姆华斯 (Tamworth) 猪等。清道光二十年 (1840) 后, 随着俄侨的迁入, 带来了俄国的白色猪, 在东北一带繁殖。德国的侨民带入约克夏猪在山东地区繁殖。日本侨民又把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带到了东北。清光绪年间 (1900 年以后), 德国人又带来大白猪, 饲养在张家口、青岛等地。1910~1933 年, 俄国侨民自流迁入新疆伊犁、塔城等地, 带入一批白猪与当地黑猪进行杂交, 形成了大量白色杂种猪群。

辛亥革命后, 我国早期留美学生陈振先归国后, 充任奉天农事试验场场长时, 曾从国外引入巴克夏猪, 对东北地区的猪进行改良。1924 年陈宰均先生在青岛李村建立新型猪场, 引入约克夏猪进行猪种改良工作。1929 年由晏阳初先生兴办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了改良定县本地猪, 曾试用波中公猪与本地母猪杂交, 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外国猪种的不断引入, 与我国地方猪种进行杂交改良, 使我国猪种质量有了很大变化与提高。我国猪的饲养量 1911 年辛亥革命时为 4 124.4 万头, 仅次于美国 4 728.4 万头, 居世界第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 1935 年, 我国养猪总数达到 7 853 万头, 为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我国广大农村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前破坏, 养猪生产急剧下降, 到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 猪的饲养量下降到 5 775.2 万头, 比 1935 年下降 26.5%。

二、中国现代养猪业的发展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农村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 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发展养猪的方针政策; 1954 年 4 月 7 日,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发展毛猪生产的指示》; 1955 年 12 月 7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增产生猪的指示》; 1956 年 3 月 14 日至 22 日, 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畜牧兽医工作会议, 制定了今后 12 年发展畜牧业生产远景规划; 1956 年 7 月 14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适当提高生猪收购价格》的社论; 1957 年 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 1957 年 3 月 14 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向各级妇联组织发出《关于发动妇女大量养猪的通知》。1959 年 10 月 31 日, 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并大力鼓励私人养猪, 分配给农民自留地、饲料地、适当提高生猪收购价格, 大大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使我国的养猪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65 年 6 月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畜牧工作会议, 对我国养猪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使生猪头数迅速增长。特别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养猪业在改革中前进, 在发展中壮大, 科技含量不断增加, 生产水平明显提高。正在由分散型向集约型、由传统型向现代科技型、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生猪存栏数稳居世界第一, 猪肉产量跃居世界首位, 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养猪和产肉大国。

(1) 猪的存栏数和猪肉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2) 短短 3 年内, 生猪的头数已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1953 年全国猪的存栏数达 9 613.1 万头, 超过抗战前最高水平的 22.41%。至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生猪存栏数达到 14 589.5 万头, 比 1953 年增加了 51.77%, 为抗战前最高水平的 1.86 倍。到 1965 年, 生猪的头数达到 16 692.5 万头, 1970 年为 20 610.1 万头, 1976 年为 28 725 万头。1978 年达 30 128.5 万头, 较 1949 年增加 24 353.3 万头; 2003 年达 47 001.0 万头, 较 1978 年增加 16 872.5 万头 (表 1-1)。

表 1-1 我国生猪主要年份年末存栏数

(万头)

年份	存栏数	年份	存栏数
1949	5 775.2	1980	30 543.1
1950	6 400.6	1985	33 139.6
1951	7 440.1	1990	36 241.0
1952	8 976.5	1991	36 397.5
1953	9 613.1	1992	37 973.9
1954	10 171.8	1993	39 300.0
1955	8 972.0	1994	41 461.5
1957	14 589.5	1995	44 169.1
1958	13 828.9	1996	45 219.8*
1960	8 226.5	1997	46 564.2*
1962	9 997.2	1998	40 842.5*
1965	16 692.5	1999	42 920.2*
1970	20 610.1	2000	43 754.1*
1975	28 117.0	2001	45 441.0*
1976	28 725.0	2002	46 469.5*
1978	30 128.5	2003	47 001.0*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带*号者来自 FAO。

猪肉总产量 1978 年 856.3 万 t,出栏率 53.47%。2003 年 4 556.65 万 t,出栏率 124.74%,较 1978 年总产量增加 3 700.35 万 t,出栏率提高 71.27 个百分点。

人均猪肉占有量大幅度提高,1952 年 5.95kg,1965 年 7.70kg,1978 年 9.00kg,1980 年 11.60kg,1990 年 19.40kg,1995 年 31.64kg,1996 年 32.93kg,1997 年 34.79kg,1998 年 29.41kg,1999 年 31.46kg,2000 年 33.77kg,2001 年 33.40kg(图 1-11)。2001 年与 1978 年相比,猪存栏数增加 1.531 亿头,出栏数增加 4.007 亿头,猪肉产量增加 3 442 万 t,人均占有猪肉增加 24.3k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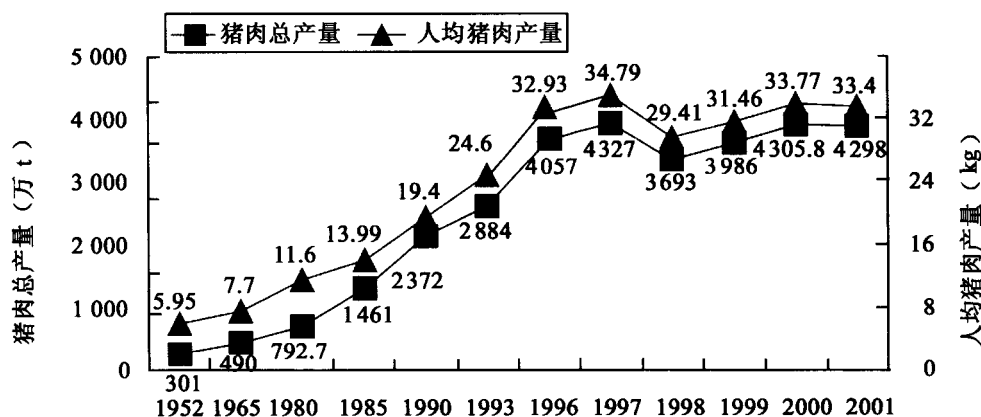


图 1-11 我国的猪肉产量和人均占有量 (FAO)

(2) 开放市场,改善经营 开放市场使养猪业运转体制发生了可喜转变,牧工商一体化的经营体制,改变了产、供、销分割,促进了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产、学、研结合,促进了养猪产业化发展。

(3) 规模养猪迅速发展 规模化、集约化、工厂化养猪和菜“篮子”工程的实施,开创了养猪产业化的新局面,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施,为养猪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和促

进作用。据统计，2002年全国50头以上的规模户103.5万户，比上年增加11.1万户，增长12%，年出栏生猪16598万头，比上年增加2475万头，增长17.5%。规模猪场出栏猪占生猪总出栏量的29.3%，比上年增加3.5个百分点。

(4) 加强猪种资源保护和良种引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对全国猪种资源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猪种》、《中国猪品种志》等，在猪种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和选育提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第130号公告，确定了19个地方猪种为国家级猪种资源保护品种。为适应养猪生产发展的需要，积极引入国外瘦肉型良种猪，除长白猪、大约克夏猪外，还引进了杜洛克猪、皮特兰猪和汉普夏猪，以及迪卡、PIC、斯格和达兰等配套系猪。进行了新品种（系）或配套系培育和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育成了40多个新品种（系）或配套系猪，研究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杂交组合，筛选出一批优异的瘦肉型商品杂优猪。

(5) 饲料和添加剂工业跃居世界第二 20年前我国的饲料和添加剂工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饲料工业大国。2002年全国配合饲料产量达8000万吨，猪和禽的配合饲料占很大比重。

(6) 疫病防制成绩显著 彻底消灭和不同程度的控制了一些疫病的发生，某些疫苗的研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基因工程苗取得很大进展，对一些疫病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生物学水平。

三、中国猪种对国外养猪的影响

我国劳动人民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下，经过精心培育，逐渐形成丰富多彩的猪种资源，其优良品质很早就受到国外的关注，对国外一些著名猪种的育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达尔文早在1868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就写道：“中国人在猪的饲养上和管理上费很多苦心，甚至不允许它们从这一个地方走到那一个地方。因此，这些猪都显著地呈现了高度培育族所具有的那些性状，所以，无可怀疑地，它们在改进我们的欧洲猪品种中，是有高度价值的”。

据史料记载，中国猪种输出国外早在东汉时代（公元25~220）已开始。从华南汉墓出土的汉代青瓦猪来看，我国汉代的小耳型猪（属华南猪类型）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阔，背腰宽大，臀部及大腿发育良好，四肢矮小，已具有早熟、易肥、发育快、肉质好的特性。

《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这就是说，番禺（广州的古称）在秦汉时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并且，与外洋已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当大秦（罗马之古称，公元27~395）商人东来贸易之时，对当时广州的这一猪种必然发生兴趣，便携带回国，与古罗马当地晚熟、肉质差的猪种进行杂交，这样就形成了罗马猪，而罗马猪对于近代西方的一些著名猪种的育成，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猪种对国外猪种第二次发生较大的影响是在清代（公元1644~1911）。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清政府为了便于征收税项和容易管理海船的贸易，一切外船只准停泊在广州来进行经商，当时中国只有广州一地成为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英国人经常来往于英国与广州之间，他们发现了广州附近的优良的中国猪种后，就把它运回本地，改良他们的猪种，在18世纪中叶，英国本土的中南部，已有大量广东猪存在。这些中国猪与当时体大、骨粗、后躯发育差、耳大下垂、肉质粗糙的英国本地猪杂交，就产生良好的效果。

在 18 世纪中、后期育成的英国巴克夏猪（Berkshire）、约克夏猪（Yorkshire）和美国的波中猪（Poland-China）、切斯特白猪（Chester White）等，都含有大量的中国猪的血统。特别是大约克夏猪，从改良过程中可以看到，至少含有 50% 的中国猪血统（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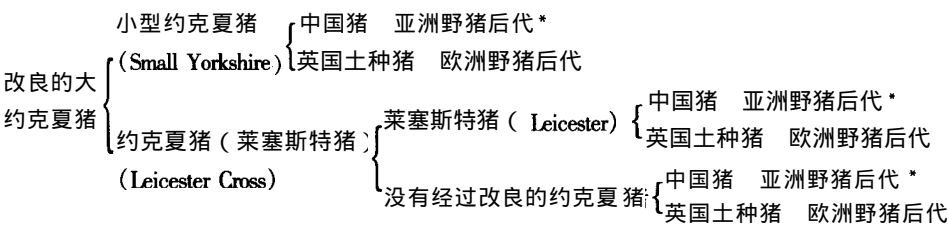


图 1-12 大约克夏猪的改良过程

(C.S.Plump, Type and Breeds of Farm Animal, 1920, New York)

* 应为欧洲亚洲野猪后代 ——编者著

(引自赵书广等,《中国养猪大成》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中国猪种对世界猪种发生第三次较大影响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1979 年，我国农业部向法国农业部赠送了 6 头太湖猪（梅山猪和嘉兴黑猪各 1 公 2 母）。经过繁育、扩群和饲养观察，中国太湖猪的高繁殖力性状使法国人十分惊喜，并作了报道。

法国国家 INRA 遗传研究中心试验结果表明：纯种梅山猪是最高产的，虽然梅山猪与法国大白猪排卵数基本相同，但梅山猪比法国猪胚胎死亡率低很多，梅山猪是 16%，而欧洲大白猪是 26%。专家们认为中国猪对西方猪遗传改进最大的作用可能是提高母猪生产力。因此，他们试图用梅山猪作为合成母系的育种素材。

英国在 1987 年 4 月从中国引进了 4~6 月龄梅山猪 32 头（10 公、22 母）。经过观察表明，梅山青年母猪与大白猪相比，排卵数较高（18.51 枚比 15.19 枚），这一点与法国不同。胚胎存活率也稍高（71.1% 比 70.8%）。之后，匈牙利、日本、美国等国家相继引入了中国太湖猪，以提高本国猪种的繁殖性能和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良效果和研究成果。同时，中国猪种肉质优良，无 PSE 肉。这也是可利用的性状。但中国猪生长慢，胴体中脂肪比例较高。因此，他们在使用时较为谨慎。但对中国太湖猪的高繁殖力性状则是一致肯定的。

1990 年和 1992 年分别在法国和中国哈尔滨召开了《中国猪种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中国猪种对世界猪种的改良起了促进作用。

我国养猪业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猪肉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提高猪肉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养猪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第四节 中国养猪科技的发展

1949 年以来，随着养猪生产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养猪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 30 年，科技发展尤为迅速，科技进步对我国养猪业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猪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养猪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猪种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为了摸清我国猪种资源的情况，曾数次组织技术力量，进行品种资源的调查和研究。1953年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全国各类家畜品种调查提纲（草案）》。1954~1956年由各地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协作，开展了部分地方优良家畜品种的调查，撰写了调查报告，编著了《祖国的优良家畜》（I~IV）。1959年浙江、广东、江西、湖北等省和上海市对本省（市）的畜禽资源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196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编辑了《中国猪种介绍》（第一集），汇集了全国35个优良地方猪种。根据1972年9月召开的“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座谈会”的建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市农业科学院主持，组织全国有关单位，编辑了《中国猪种（一）》和《中国猪种（二）》2册，汇集了全国47个猪种。

为了加强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工作，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将“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列为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14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部分家畜家禽的试点调查。1979年4月，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议”，会后29个省、市、自治区均按全国统一调查提纲，开展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全面的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在猪种资源调查中，发掘了一批新品种，研究解决了大部分地区的“同种异名”和“同名异种”问题，为进一步保存、开发和合理利用猪种资源，科学地做好品种区划和品种改良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6年，出版了《中国猪品种志》，列入品种志的地方猪种48个，培育品种12个，国外引入品种6个。各省、市、自治区还分别编辑出版了地方品种志，全面介绍中国猪遗传资源。1979年农业部立项研究“中国主要地方猪种质测定”，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数据。1995年，农业部将“畜禽品种资源多样性补充调查”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对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进行了动态信息调查，同时对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省、自治区畜禽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地方猪种资源。1996年1月，农业部批准成立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其宗旨是组织协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发掘、评估、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工作，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对畜禽资源保护工作的指导和领导。1999~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将“畜禽种质资源收集、整理、保存”列为基础性工作项目，进一步收集畜禽资源的动态信息，建立信息系统；研究新的保种方法，建立动物种质资源体细胞库。2003年，科技部将“动物种质资源描述标准、技术规范及共享试点”列为自然科技资源平台项目，通过研究做到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共享和实物共享。近20年，我国加强了对猪品种资源的基础研究，开展了猪品种的种质特性和遗传距离测定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并在畜禽系统保种理论和保种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为猪品种资源的保存工作提供了科技支撑。

二、猪种的选育和提高

1959年，农业部召开畜牧工作会议，提出了“本品种选育与杂交改良并举，全面开展家畜家禽育种工作”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确定我国猪育种的基本原则是：

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要保证猪种原有的优良特性。并从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使得猪的选育工作广泛开展，逐步得到了提高。

有计划地开展选育工作。凡经过调查确定的地方良种，各地分别在产区建立了良种猪场，或成立育种辅导站，进行有计划的选育工作。例如，从 1953 年起，在浙江省建立了金华种猪场，在四川省建立了荣昌种猪试验站和内江种猪场，在河北省建立了定县猪场。此外，还成立了新金猪、垛山猪、沙子岭猪、大花白猪等育种辅导站，积极开展良种猪选育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地方猪种的生产性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培育了一批新猪种。1972 年 9 月，农业部委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市农林局、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组座谈会”，并成立了由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组，制定了《全国猪育种协作规划》，提出了《关于猪种选育若干技术问题的意见》。1973 年，在广东省顺德县召开了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第二次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地方品种选育，积极培育新猪种”的方针，重申了“以生产性能为主，兼顾体型外貌”的技术路线。会上成立了猪选种方法与遗传理论、品系繁育、杂优利用和饲养管理四个专题研究协作组，并先后建立了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的协作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猪育种科研大协作。至此，全国性的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地方猪种选育提高和新品种培育工作全面展开。选育提高了一批优良地方品种，如太湖猪、民猪、金华猪、内江猪、荣昌猪等。培育了一批新猪种，如哈尔滨白猪、新金猪、东北花猪、新淮猪、上海白猪、伊犁白猪、汉中白猪、赣中白猪、北京黑猪、山西黑猪、泛农花猪、三江白猪、湖北白猪、浙江中白猪、南昌白猪、军牧 1 号、苏太猪等 40 多个新品种（品系）。1983 年国家科委将“商品瘦肉猪生产及配套技术开发”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而后，又以“中国瘦肉猪新品系选育和配套研究”列入“七五”、“八五”和“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并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优质瘦肉型猪新品系选育与繁育新技术研究开发与示范”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30 年来，在猪品系繁育研究方面，总结了系组建系、群体继代选育和近交建系的经验，并在猪的育种实践中加以应用。在遗传理论研究方面，对猪主要性状的遗传规律，如毛色、生长发育、繁殖性状、遗传疾患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应用在育种实践中。数量遗传、生物统计已在猪育种工作中广泛应用，分子遗传在猪育种中的应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97 年 9 月，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猪品种审定委员会是其所属的专业委员会之一。1998 年 7 月，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制定了《猪品种（配套系）审定标准（试行）》；2003 年 10 月，制定了《国家级畜禽品种（配套系）审定规程（试行）》。这些标准和规程在指导、规范全国畜禽品种（配套系）审定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猪的育种工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广泛地开展了猪的杂交利用工作。为了迅速提高猪的产肉能力，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了猪的杂种优势利用工作，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最佳杂交组合，筛选出一批二元或三元商品瘦肉猪杂交组合，如北京的杜 ×（长 × 北）、大 ×（长 × 北）浙江的大 × 浙；上海的杜 × 上；湖北的杜 × 湖等。目前，有更多的杂交组合在养猪生产中广泛推广；在技术条件成熟的地区，猪的杂交利用已进入了配套系生产杂优猪阶段，如光明猪配套系、深农猪配套系等。

三、猪的饲养标准

我国猪的饲养标准，从 1973 年开始进行了协作研究，根据饲料资源现状和猪的营养需要，于 1983 年制定了我国《猪的饲养标准（肉脂型）》，1985 年又提出了中国瘦肉型猪的饲

养标准，并编制出《猪鸡饲料营养价值成分表》。随着养猪生产的发展，猪的品种和杂交模式发生了变化、饲料资源和饲养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动物营养代谢研究越来越深入，因此，猪的饲养标准也在不断修订，以便更有效地提高猪的生产性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章 中国猪种资源与利用

中国养猪历史悠久，猪种资源丰富，对世界养猪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地方猪种具有性成熟早、产仔数多，肉质好，抗逆性强等优良特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生长速度慢，饲料转化率低，胴体瘦肉率低等。我国是世界上养猪数量最多的国家，年存栏量 4 亿多头，约占世界存栏总量的 40%。养猪分布面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目前，由于从国外引入了许多瘦肉型猪种，对我国地方品种进行杂交改良，使我国地方猪种的保护受到严重的冲击，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我国猪种资源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必须尽快着手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

第一节 中国猪种资源概论

一、中国猪种资源

中国是世界猪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列入 1986 年出版的《中国猪品种志》的猪种有 66 个，其中地方品种 48 个，培育品种 12 个，引入品种 6 个。随着我国养猪业的不断发展，培育品种和引入品种的数量有所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培育品种达到 15 个以上，引入品种达到 9 个以上。中国猪种资源丰富，对世界养猪业的过去和现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地方猪种具有性成熟早、产仔数多，对不良环境耐受力强，早熟易肥，肢蹄健壮，性情温顺，肉质好，猪肉多汁，风味好，肌肉细嫩等优良特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生长慢，饲料转化率低，胴体瘦肉率低等。我国培育猪种的性能一般介于国外引入品种与地方品种之间，与引进品种相比，繁殖力强，母性好，发情明显，体格健壮，适应性强，肉质鲜嫩多汁，保持了地方品种的一些优良特性。但在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胴体瘦肉率等方面还不及引入品种，尤其是胴体性状差距较大，背膘较厚，眼肌面积较小，胴体瘦肉率比引入品种低 5~10 个百分点。但近年来培育的瘦肉型猪种，如三江白猪、湖北白猪、浙江中白猪、湘白猪等，生长肥育性能和胴体性状与近年来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差距不大，而肉的质量优于引入品种。我国从国外引入的品种有十余个，其中对我国猪种改良影响较大的有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大约克夏猪、苏联大白猪、克米洛夫猪、长白猪、杜洛克猪、汉普夏猪等。这些猪种在我国长期进行纯种繁育和驯化，已成为我国猪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猪种在过去和现在对我国新猪种的培育和杂交商品猪繁育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猪种分布与环境条件

我国养猪历史悠久，至少有 6 000 年历史。是世界上养猪数量最多的国家，年存栏 4 亿多头，约占世界猪存栏总数的 40%。养猪分布面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由

于各地区的地形、气候条件、土壤相差悬殊，农业生产与饲养基础均不相同。人们对猪的要求也各异，必然会发展成许多品种。这些品种按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大致可划分为华北、华中、江海、华南、西南和高原 6 个主要的地区类型。其分布与环境条件如下：

华北型 在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的猪种，地处中温带，气候干寒，土壤含钙量大，农作物以麦类、杂粮为主。猪的日粮中农副产品粗料占的比例稍大，饲养管理略粗放。

华中型 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之间广大地区的猪，地处中亚热带及南亚热带，土壤多为酸性，气候温和，农业发达，以水稻为主。猪饲料丰富多样，精料较多，青绿和水生饲料也很充足，猪的饲养管理较细致。

江海型 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处于华北型与华中型中间的狭长地区，属中亚热带，自然条件较好，气候温和，农业发达，饲料资源丰富，饲养管理较细致。

华南型 分布于南亚热带及北热带的华南型猪，该地区气候温热，青饲料比较丰富。

西南型 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和云贵大部分地区，地处中亚热带及南亚热带，各地的自然气候及饲养条件差异较大。

高原型 主要分布于 3 000m 以上的青藏高原，气候干寒，植被稀疏，农作物生长期短，饲料缺乏，猪多终年放牧，主要是采食野生饲料。

第二节 中国猪品种

一、地方品种

（一）概述

地方猪种是指原产于我国的猪种，属脂肪型品种。地方品种和原始品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原始品种是指那些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生产性能较低的品种。而许多地方品种是高度培育品种，如太湖猪、金华猪、民猪等。我国有地方猪种 48 个，其共同的特点是繁殖力高，肉质好，耐粗饲，抗逆性强，生长速度较慢，屠宰率低，胴体瘦肉率低。猪的体型是“北大南小”。毛色是“北黑南花”。产仔数以太湖猪为最高，向北、向南、向西有所降低。

（二）我国地方猪种的类型

按照各地猪种的生产性能和体型外貌特征，结合其起源、分布和饲养管理特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自然条件等因素。我国地方猪种可分为 6 种类型：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

1. 华北型

华北型猪种主要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北，包括自然区划中的华北区、东北区和蒙新区。华北型猪的特点是，体躯较大，背腰狭而平直，腹部下垂，臀部倾斜。头较平直，嘴筒较长，额有皱纹，且多纵行，耳大下垂。四肢粗壮。皮厚，毛长而密，鬃毛粗长，冬季丛生棕红色的绒毛，以抵御寒冷。毛色多为全黑，偶在末端出现白斑。繁殖性能较好，性成熟较早，母猪一般 3~4 月龄时初次发情，经产母猪每胎产仔 12 头以上，乳头 8 对左右，护仔性强。生长速度较慢，胴体瘦肉率较高，肉质较好，肉味鲜美。华北型猪种主要包括：民猪、八眉猪、黄淮海黑猪、汉江黑猪、沂蒙黑猪等。